

开卷丛书

百合与壁虎

中国当代小说卷

张祥班澜 编著

就这样，我结了婚，

可怪的是我竟过着前所不耻的那种生活。

我现在只是盼望，盼望着秋天赶快过去，

那时，即使是廊下的墙上

也不会有嘲笑我的可恶壁虎了。

并且最重要的，

我需要毫无愧怍去接受我的丈夫的温存呵！



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常安

封面设计

徐未未

内文设计

姚雪琴

· 开卷丛书 · 编委会

主 编	杨匡汉	赵喜民	
副主编	汤学智	陈绪万	张德祥
编 委	赵喜民	杨匡汉	汤学智
	陈绪万	张德祥	傅美琳
	赵常安	鲁小红	田和平
	王志章	沈 斌	姚雪琴
	高光起	卢兴基	李 易
	蒋守谦	孟繁林	王保生
	贺学君	董之林	刘 纳
	吴岳添	班 澜	邓晓丽

面对绵延的高山巨灵

杨匡汉 汤学智

人生需要两种空间——物质的空间和精神的空间。作为文明之花的文学，为人类生存提供着广阔的精神空间。

人的生命如逝水，一去而不复返。惟文学与艺术，往往可以追回人们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或进入另一种足资向往的可能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当你工余饭后，案前林下，一卷在手，古往今来，神游物外，可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生命，抚慰心灵。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如良师耳提面命，有如友朋品茗夜话，有如情侣倾诉衷肠，亦有如听风听雨过清明……故古人有“开卷有益，不以为劳”之说。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企望视野的开放和精神的拓展，那就应该对文学，尤其是本民族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和体认，从而进至文明度更高的精神生活之中。

当你开卷时，你所面对的文学世界，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和浩瀚的。

从本质论角度看，文学是人学，也是心学。它是人的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歌唱，是人的情感和智慧孕化的产物，是人的具有无限创造潜能的本质的自由显现。文学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内在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文学；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而且，只要人类还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文学之花也一定会愈开愈鲜艳。在文学内涵中，最深

刻的便是它所体现的人的内在精神的普遍性底蕴；同时，由于任何人群、任何民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成、发展和演化的，并由此铸造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个性，故而文学又自然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风貌和文学精神。

从本体论角度看，文学是承载生命信息的语言建构。在长期的文学积淀中，形成了由各种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文本构成的文体系统。以文体类型而论，文学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类型构成；以审美需求而论，有俗文学与雅文学之别；以创作流程而论，又有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分。所谓民间文学，是指大多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民众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的形式，在人民大众中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所谓通俗文学，是指用通俗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大众所喜爱的生活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都流传于都市市民中间，也可称为市民文学。所谓雅文学，是指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层次与功能不同的各种文学共生互补，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学的百花园。每一种具体文学样式，每一部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的灵魂与血肉。正是这些众多的“生命”，建构起文学的生命系统。

从发展论角度看，在历时方向上，文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共时形态上，它又包含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学。同时，它还是一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的文学，人类正在不断地把自己从现实发展中展示出来的新质注入其里。因此，我们看待文学，必须站在本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创造所积成的巨大精神财富上，既不能割断古今，也不可划地为牢，应对文学的传统予以充分的尊重，对文学的创新持宽容的器度。

《开卷》作为普及性的大型文学丛书，旨在重点介绍和阐释中华民族文学、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有助于读者阅读，有必要对中国文学的常识，作一些说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有 5000 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汉民族文学始终居于主导的和中心的地位。早在文字发明以前，汉民族的文学就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在人民口头诞生并流传了。像“女娲神话”、“羿神话”、“大禹传说”等等。这些独具特色、有永久魅力的上古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

中国文学的发展，一般按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上起先秦时期的西周，下至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 3000 余年。

诗歌是产生最早、发展最充分、成就也最为辉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有“诗歌大国”之称，古代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前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者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气势磅礴，想象奇特。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进入黄金时代，诗人辈出，诗篇累累，形成了以律诗为标志的近体诗。宋元之间，同诗有着密切联系的两钟文体“词”和“散曲”，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分别成为宋、元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志，故有“宋词”、“元曲”之说。词和曲是诗与音乐结合的产物。它们比律诗更为自由、灵活，利于传情达意。

古代文学中产生较早的还有散文。散文的源头可推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庄子》等诸子散文。古代散文的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中的诸子散文；二是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涌现了“唐宋八大家”；三是明清时期，诸如“竟陵”、“桐城”等流派的散文，

均异彩纷呈。

古代小说出现和发展较晚，这同它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邪宗”有关。小说虽萌芽于汉魏六朝，唐（传奇）宋（话本）时期均有长足进步，但比较繁荣发展的局面直到明清两代才出现。这是那时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明代主要是“拟话本”和通俗体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描写日常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小说《金瓶梅》。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已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转向描写现实社会的寻常生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领域。清代的《红楼梦》便在这一艺术方向上，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高峰。此外像《儒林外史》等等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虽同“志怪”、“传奇”一脉，但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中，包含着对自由幸福和光明的追求，成为文言小说的翘楚。

古代戏曲的开端是元人杂剧。杂剧包括“唱”、“念”、“做”等多种戏剧样式，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综合体。它最初以北京（大都）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很快传遍全国。元、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华古国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开始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史称近代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近代文学。

这一时期，政治上、军事上失败的现实，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国体的腐朽、文化的落后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文学上有着明显的反映，最突出的是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在这种主张影响下，出现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和《孽海花》（曾朴）等一批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为主的“谴责小说”。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作家、诗人。自此以后，就其主流来看，文学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社会和文学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多变，这给文学以直接的影响。“五四”前后，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随着自身的日益觉醒，要求文学更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斗争生活，并且在形式和语言上进一步要求通俗化、大众化。30年代后期开始了抗战文学时期，其中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以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上海的“孤岛”文学，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抗争文学。现代文学时期尽管只有短短30年，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使它彻底完成了文学采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内容上的深刻转变，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积极的革新和发展，开拓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从而使中国文学开始同世界文坛声息相通。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艾青、曹禺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40余年，在大陆，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颂歌文学”为主潮。到文化大革命，整

个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的惨痛事实，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反省，这就促成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到80年代，反思由社会角度进入人的层次，继而又深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遂有“寻根文学”之问世。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青年作家现代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倾向的探索。从历史眼光看，“文革”以后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突破性的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是新中国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包括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文学。台港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异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发展，有其明显的殊相，但同根同宗同文，其人文精神和语言风貌，却与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相通。台港地区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理应纳入“开卷”者们的视野。

中国文学又具有多民族性。除汉族外，尚有55个兄弟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民族，如藏、蒙、维吾尔、哈萨克、纳西、彝、满、柯尔克孜等族，都有自己的文学，这些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有不少优秀的民族作家。有些民族还出现了能以汉文写作的著名作家，如杂剧作家李直夫（满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杨讷（蒙古族），词人纳兰性德（满族），作家尹湛纳希（蒙古族）等。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除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外，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有如璀璨的明珠，与汉民族文学互相辉映，把中国文学的花苑装点得绚丽多姿。

中国文学历经了如此漫长的旅途。这片故园神州，是它丰腴的精神沃土，一代接一代地生长出文学之树、艺术之果。这世代相续、不断繁荣的文学艺术，恰似绵延的高峻山岳的巨灵，震撼着也温暖着人心与人生。我们为之自豪的还在于，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精神历来互相交流和影响，从而为文学的民族融合、艺术发展不断开辟着道路。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始终是鲜明的、无可替代的。这也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人文精神有其极为丰富的包容性，体现出举世公认的博大深远的气象。

基于上述的认知，《开卷》丛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深入浅出的叙述，系统而又简要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华民族文学的基本脉络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之精萃，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达此目的，丛书诸卷取以“文”为主、“文”“史”结合的编著体例，既侧重精选作品和文本导读，同时对所涉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品类的概貌、特征、价值等进行史的分析。全套丛书共24卷，其中包括外国散文、小说、戏剧各一卷，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编著者均为在各自学术领域里耕耘多年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然难以呈示伟大祖国无比丰富与恢宏的文学景观。但愿它作为广大读者的人生伴侣，携您共同步入辉煌的文学殿堂。

1993年夏 北京

前言

班 澜

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内里是小说意识的嬗变史。

小说意识是指一种整体性的艺术观念，或者说是作家对小说艺术的追求与修养。它主要体现为小说家对生活的理解形成的哲学观念，对艺术的理解形成的美感意识和审美标准，以及以这二者为基础的对小说的内容、表现方式和功能等方面的整体把握。一个小说家的意识受着时代、历史生活的制约，同时奔涌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也鲜明地打着气质、个性的烙印。这是一种复杂、活跃的构成，在小说创作中，它是创作主体的本质因素。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小说意识，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这种同构性，使我们通过阅读作品了解当代小说家的小说意识状态成为可能。

多年来，我们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强调客体对主体的决定作用，评价作品、作家也多以社会功利为尺度，指归是社会思想和政治内容，其他因素则被压缩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在这种状态下，小说观念是比较划一的，就是把小说作为社会生活的形象摹拟。这种小说意识在创作主体的系统中只是一个认识的层面，是基本的也是较低的层面。它在对艺术创作主体的解释上视为被动反映，以描摹外部事件，图解即定理性认知模式，寻求直观说服和震动，而遮掩了其他更高层次的表现。从 50 年代初到 60 年代中期，这是一种主

导的小说意识。这一段时间产生的大量作品,时至今日,许多已经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例如绝大部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由于对生活只作平面的镜式反映,生活变革发生的历史再认识,反而使它们显得失真了,即使像《创业史》、《山乡巨变》这类功力深湛之作,也因之产生了可议之处。相反,那些体现了艺术个性,社会观念似乎不那么强的作用,如《铁木前传》、《禾场上》、《蛮蛮》等,倒见出了真实和深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

从认识论的意义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并不把意识反映现实的过程理解为机械的、镜子式的复制,而是理解为辩证矛盾的过程。说起镜子,倒使人想起 M. C. 埃舍尔那幅题为《举着反光球的手》的著名版画,画中的球反射出举着球的画家及其所在的书房,同时我们在反光中也看到了画家举着的球本身。他画出了主体与客体互为反映的情状。而这种被称为 GEB 的神秘链环在小说创作中同样存在:创作主体的作家以其意识接受和反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而作品反映的艺术客体也接受和反映了创作主体本身。如果承认作为精神生产的小说创作对生活的反映是能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尊重小说家思考和解释生活的权力,这意味着小说家对生活应有自己的发见。在十七年的创作中,我们的小说家本不乏这种思考与发见的意识,如《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乃至《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选》、《在悬崖上》、《寒夜的别离》、《小巷深处》、《红豆》等。不幸的是,这些作品遭到的无理批判,把小说家的健康的创作意识践踏了。甚至连赵树理这样的作家,也不得不回避现实问题,而写出《杨老太爷》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这我们不难理解,在 60 年代初何以突然出现了《陶渊明写挽歌》、《杜子美还家》等一批历史题材的作品了。

如桑塔耶纳所言,艺术表现可以区分为互相关联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有表现力

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遥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在小说创作中，作家意识与生活材料有机地构成作品与内容，因此也包含上述两项。小说家笔下通常包含两个层次内容：题材、人物、情节、结构、语言为显层次；意境、哲理、风格为隐层次。前者在表现上要求形象的具体、鲜明、有序，后者要求深邃、感知与悟性。对小说意识来说，也相应地存在着表层意识和深层意识。表层意识瞩目于显层次，着力于对客观外部世界的把握；深层意识则钟情于作品的隐层次，重在主观精神的伸张。一般来说，有成就的小说家总是要走向深层意识，去做艺术的探险。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也不乏艺术的探险者，像茹志鹃的《百合花》之类的吹箫踏月之作，像林斤澜的《新生》、《惭愧》之类的凿石铸金之作，很有开拓之义，却也受到冷淡或批判。这种创作环境之下，自然就会造成小说意识的禁锢与封闭状态，从而将小说艺术拘囿在浅尝辄止的窘境。

若说到“文革”时期，在“三突出”原则的指导下，很难谈到什么创作，那时的小说只不过是配合“中心任务”的制作。小说自然也难称是小说。这种极端状态，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使小说家的意识更封闭，更僵化；一是高压中孕育了打破桎梏，回归艺术本原的要求和力量，所谓物极必反。

我国人民在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悲剧命运之后，告别了思想的盲目和僵化，开始以清醒而坚定的步伐走自己的道路。可以说，自由的思考是当代人的思想特征之一，当代小说意识发生的重要转换就是在这一点上。小说开始从对现成的政治概念的图解，走向对生活的理解和思索，这种小说增加了理性色彩，对现实生活变得更敏感。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几乎一发而不可收，社会的重大问题，当代人的情绪、心理和思想，都迅速地得到揭示，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已远非十七年可比。诸如《人到中年》、《沉重的翅膀》、《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无不震聋发聩，使社会轰动不已。

在新时期的小说意识中,体现着清醒的当代意识和发展的文体意识。真正有资格充当时代先导的小说创作,应该使人们感到自己最迫切的要求、愿望、情绪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包括最隐秘的心灵的微波、稍纵即逝的直觉都得到最有力度的外化形式。当代性,是时代对小说创作第一位的要求。更新,是使小说意识保持当代性的最显著特点。发展着的社会生活,永远是小说意识更新的物质基础,是主导的原动力;而在小说意识自身包含着创造的欲望,这也正是小说意识更新的内在张力。小说意识属于动态结构,它各方面的运动始终在运动中,当有新的因素介入,有时像一粒石子的滚落引起一次山崩一样,会使小说意识发生很大变化。今天,我们不能不注意到,20 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生活发生着巨变。社会生活变得繁复了,节奏加快了,这使世界变小了,人的心理空间扩大了,精神的内聚力加强了,人们在寻求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整体性也是当代人思想特征之一。当代小说意识也在寻求整体性、运动性地把握世界,并很快在创作中得以体现。近年来,小说时空观念的变化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作家往往熔过去、现在、未来于一炉;农村、城市、自然,国内与国外,外部时空与心理时空,相互交织,构成立体多维的生活图画。而在人物性格、心理方面,呈现出复杂性、丰富性、甚至混浊性的表现,也大大突破了对典型形象的原有的理解。这方面的试验,较早的较突出的是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杂色》等作品,与其说他是在借鉴外国现代艺术手法,不若说是应社会变革的需要的艺术探求。艺术首重创新,像宗璞、徐怀中、高晓声、冯骥才、林斤澜、何立伟、何士光等一批富有探求精神的小说家,近年来也都有斐然的成绩,自然是与他们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的更新分不开。就是那些承袭外国现代艺术手法痕迹较重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乃至残雪的那种梦魇般的

象征小说,或者带着荒诞意味的作品,他们为表现当代人精神所做的努力,同样是有价值的。新时期的文坛所形成的对探索实验的宽容态度,无疑对小说家意识的更新是一种鼓励和爱护,这对小说创作的繁荣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在当代小说意识中,还存在着一种更注意在艺术上和文化上提高的趋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形式主义的提倡,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我们不必管他。对我国来说,当代文学在发展中,曾有很长时间忽视了小说的艺术因素和文化因素,以致产生了我国当代小说与民族文化传统,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断裂现象。强调小说的艺术因素和文化因素,正是对这种历史现象的反拨,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汪曾祺一篇《受戒》几乎引起了一场心理的地震,我们的小说家们思忖着:小说可以这样写吗?再去寻根探源,原来沈从文先生以前就这样写过,《边城》就是例子。于是有了“淡化”之说,其实淡是化不出来的,而是中国文人历来主张的一种修养,人淡文自淡也。这是艺术表现的形式问题,更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文学传统。于是由沈从文又转向对古典小说、笔记的注意,创作便有“新笔记体”出现。或称又受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感召,出现了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以“文化寻根”引起强烈反响。但这批文化寻根之作,太多地沉溺在对无意识的心理原型的发抉,对活在生活本身中的文化反生出一重遮蔽。以后便有反省和新的认识,新的尝试。小说意识的发展,就是在作家不断自省,不断否定自我,又选择新地的过程中前进的。小说文体意识的觉醒,产生出马原、扎西达娃、洪峰等讲究“叙述意味”、玩弄“叙述圈套”的创作之后,又很快进到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格局,也体现了小说意识这种更新规律性。小说在艺术上与文化上,企向更高层殿堂的努力,需要这样承续性地运作,永无止境。小说意识的更新与创作的进展,在新时代可以说是

无愧于时代要求的。

当然，作家的小说意识是否高尚，是否是真、善、美的，要通过作品接受读者的检验。我们社会主义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因此我们的小说创作首先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要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并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也不是单一色彩的。有的人文化素养低一些，喜欢“下里巴人”；有的人文化素养高一些，欣赏“阳春白雪”；有的人愿陪“雷鸣电掣”之作而哭而笑；有的专好伴“月夜箫声”去徘徊、沉思；有的人偏爱“乡土”滋味；有的人性嗜“异域”情调……，这种种需要都是合理的，那契合这种种需要的小说创作也都有理由存在、发展。但我们的小说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作品培养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因此，我们编选这本小说集，既注意到选入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艺术表现的作品，同时也尽量选择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佳篇，并以数语附骥于后，权当导读，证诸读者，能有些许抛砖之义，幸甚。

目 录

前 言	班 澜(1)
禾场上	周立波(1)
寒夜的别离	阿 章(9)
三人行	王愿坚(22)
百合花	茹志鹃(28)
卖酒女	徐怀中(39)
蛩 蛩	王文石(50)
杨老太爷	赵树理(65)
我爱每一片绿叶	刘心武(76)
葛 覃	孙 犁(92)
钱 包	高晓声(100)
蜗 居	宗 璞(114)
头 像	林斤澜(125)
喜 悦	何士光(140)
海的梦	王 蒙(148)
条件尚未成熟	张 洁(162)
唐巧娣	陆文夫(183)
陈小手	汪曾祺(201)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205)
打鱼的和钓鱼的	金 河(224)